

## 国际储备分散化的趋势及其影响

陈 彪 如

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储备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即出现了从美元本位向多种货币储备体系发展的趋势。这是有多种原因的。但从根本上说，是美国和其它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发生变化的结果。即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了，美元的购买力削弱了。而西德、日本等国的经济有很大发展，它们的货币成为硬通货。到目前，已经形成了西德马克、日元、英镑、法国法郎等货币与美元同时成为储备货币的格局。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多种货币储备体系的发展采取赞同的态度。

但多种货币储备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的发展必将对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国际储备分散化以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就要取决于各个储备中心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因此，这种储备体系更加脆弱。

第二，各国为了储备硬通货，必然引起资

金的大量流动，这种资金的流动往往给各国的经济带来巨大困难。

第三，在多种储备体系下，各国有关货币数量和利息水平的金融政策更难于贯彻，不利于各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第四，在多种货币储备体系下，容易引起世界储备的不断增长，这是加剧世界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储备分散化也易加剧外汇市场的动荡。

为了阻止多种储备体系发展的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主张建立“替换帐户”，实行特别提款权本位。但由于各国的态度不一致，所以迟迟没有建立起来。从目前的情况看，建立“替换帐户”的方案是不切实际的，困难很多。而多种货币储备体系仍将继续发展，是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刘 石摘自《世界经济》1982年第4期)

## 关于世界银行贷款 方法的借鉴问题

龚 浩 成

一、项目贷款的管理办法可以借鉴。在以往的三十年中，世界银行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发放了项目贷款，逐步总结出了一套完整、严格的制度和办法。这套管理办法概括起来讲，就是每个项目必须经历鉴定、准备、估价、谈判、履行和评价六个阶段：由世界银行和借款人共同从有助于该国经济发展计划出发，挑选出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可行的适当项目；借款人对提出的项目进行技术、社会、经济和财务等方面的研究，通过各方面的可行性研究

分析，进行反复的比较，就可以作出初步的估价，用以选择最优方案；之后进入谈判，谈判不仅要就贷款金额、期限达成协议，更重要的是借款人为保证项目的成功应采取什么必要的措施；谈判达成协议，就列入贷款文件，经世界银行董事会批准后便进入项目的履行阶段，执行中，世界银行进行严格的监督和广泛的检查；工程完工后，要进行全面地总结。这套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借鉴。

二、成本效益分析的办法可以运用。在进行各种可行性分析时，世界银行特别强调要采取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即通过比较各种被选项目的全部预期效益和全部预期成本的现值，来评价这些项目的可行性。成本效益分析法开始只重于财务分析，后来发展到经济分析，近年又发展到社会分析。财务分析主要是从微观出发，计算某一个项目的财务成本和财务收

## “福利国家”与美国现实

傅 殷 才

当前，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国家”论广泛流行。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被广泛应用于资产阶级政府的实际活动。

按照福利国家论鼓吹者的观点，“福利国家”的特征和实质是：对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劳动者的再分配；没收（通过赋税制度）富人的部分收入转交给穷人，因而各阶层居民收入均等化；消灭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平等，消灭物质方面无保障、匮乏、贫穷等现象；达到“充分就业”，等等。然而大量统计材料表明，美国贫富悬殊的现象不是趋向缓和，而是更加严重了。据统计，占美国人口1%的最大富豪，在1929年到1949年间所占全部国民个人财富的份额有的上升，有的下降。但自1949年以后，他们所占的份额却不断增加。最近20多年来，美国社会鸿沟更加突出。据1971年《美国统计摘要》数字计算，美国制造业工人所创造的价值，1969年是1947年的3.42倍；然而他们所得工资在其创造的价值总额中的比重却越来越

益，权衡其利弊；经济分析主要从宏观出发，考察这个项目的综合经济价值；社会分析则考察项目的收益是怎样分配的。如何结合我国的情况加以运用，是否可以这样设想：

财务分析的指标有四个：净产值，收益成本比率，内部报酬率和最低成本。无论采用哪个指标，都要将全部预期效益和成本按一定贴现系数变成现值。目前的问题是，我国如何确定贴现率，应予以解决。在经济分析中，我国会遇到一个困难，即有一个影子价格的问题不好办。影子价格确定的太高太低，都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价格，而在我国实行管制外汇和计划工资制度，如何确定影子外汇率和影子工资率，都是比较困难的问题。社会分析的方法，难以对我所用。

（郭 萍摘自《上海金融研究》1982年第4期）

小，1947年为41%，1969年下降为31%。既然物质生产条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无论实行什么累进税，都不可能使收入均等化。

所谓“社会福利”，包括社会保险、失业救济、卫生保健、家庭补助、养老金、以及住房、教育、文化活动等社会服务和设施。有了这些就能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大多数人就能享受相当好的物质生活。然而这些论断的虚伪，首先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的范围和数额，远不能满足群众生活的迫切要求，许多人领不到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资金。其次，有的部分社会保险和福利设施，实质上是资本家为获得劳动力商品所不得不支付的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不过是一种间接工资或工资的转化形态。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福利越多，自己可支配的钱就越少”。1970年美国职工工资税为774亿美元，间接税为456亿美元，社会保险税为280亿美元，劳动者的必要产品扣除额共为1,510亿美元，比国家支付的社会福利费多51亿美元，比转移支付多707亿美元。上述材料证明，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是靠劳动者的必要产品实现的；战后以来，必要产品扣除额比劳动者享受的社会福利高出一倍以上，甚至高达二倍，即劳动者从社会福利获得1美元，就不得不交缴纳2—3美元的各种税款和社会保险费。

“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关心全民福利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和措施，实行这一政策就能有效控制就业水平，稳定国民经济、增加生产。但实际上，失业问题始终是美国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1978年失业率为6%，1980年为7.1%，1981年12月已上升到8.9%，失业人数超过950万。

（虞 放摘自《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